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 理性的反思 与 正义的追求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段忠桥 著

Paul Marx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 理性的反思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与 正义的追求

● 段忠桥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 段忠桥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7-81129-004-2

I.理… II.段… III.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761 号

丛书策划 李小娟  
责任编辑 张爱华  
封面设计 咸泽寿  
责任校对 董丽洁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LIXING DE FANSI YU ZHENGYI DE ZHUIQIU

段忠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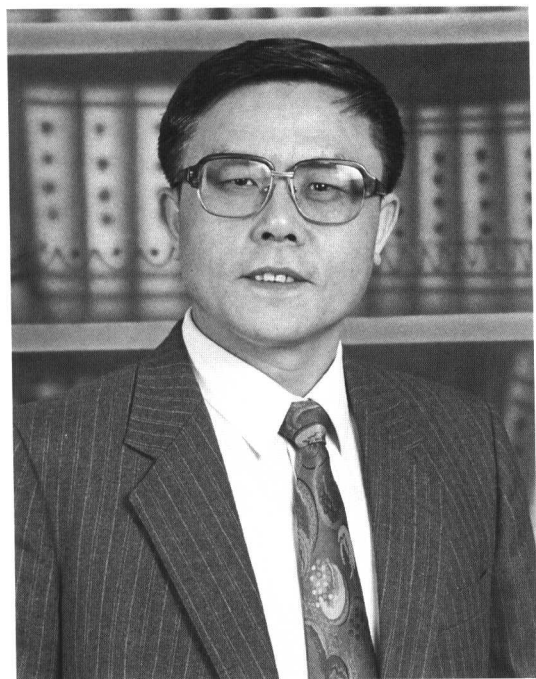
---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26.5
字 数	3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004-2/B·5
定 价	46.00 元

---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段忠桥，男，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All Souls College1998—1999年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等译著三部；主编《马克思主义史教程》、《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在《中国社会科学》、英国的《政治学》、《批判》和美国的《自然、社会与思想》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 总序

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因此而改变。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两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直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关注和重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世界的现象,并由此形成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面临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的受挫、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文化危机,一批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应运而生: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为背景,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彼得洛维

## 2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判流派,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学说具有任何其他理论都难以比拟的开放性和历史穿透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代表人物进入迟暮之年,特别是随着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相继谢世,人们原本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批判运动即将成为“告一段落”的历史。然而,历史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图景:不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一直活跃到世纪之交,而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存社会,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一些偏激的人士,如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这些变化,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进程又一次坚定地展开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减弱,反而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4年,在巴黎举行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纽约、伦敦、图宾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相继召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1999年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都名列榜首。世纪之交,不仅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样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依旧活跃,而且,德里达、杰姆逊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纷纷“走近马克思”,从不同方面阐释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作出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影响力。

我一直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不断变化。然而,无论是其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还是关于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其关于暴力革命、政党策略、欧洲革命、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还是关于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无论是其关于唯物史观原理的阐释,还是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论的探讨,在深层次上都服从于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关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体现哲学本性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奠基在人的实践内在地具有的不断超越、不断扬弃异化的批判本性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所敬重,他的学说的价值绝不会为我们的时代所穷尽。

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的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正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主题、问题域、范式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在重新阐释和张扬马克思的思想时存在多少误读和偏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像马克思一样,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它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学说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

正因为如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和指向。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表面看,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

#### 4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直接的理论反思。因此,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专业人士往往是通过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来深刻理解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他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而言,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而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说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时,忽视它们的局限性、失误和理论错误,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倾向;然而,不去认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启示,



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褊狭和封闭。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5年11月25日举行的第26次集体学习,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题,专门了解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西方国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翻译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单独设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理论热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在为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作了讲解之后,我一直考虑以某种方式来推进这种回顾和总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是几位中青年学者过去十几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成果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式、理论评价、推陈出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某些理论失误。正因如此,适时地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清醒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别的意义,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同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

衣俊卿

2007年11月15日

## 序 言

本书是我 1991 年以来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sup>①</sup>的部分成果的展示。全书根据我研究的实际历程,即在不同时期先后涉及的四个领域,把我这十几年陆续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的与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三十几篇论文和译文分为四编:第一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第二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编“市场社会主义”,第四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英美马克思主义”。

第一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收录的是我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成果,它们发表于 1994 年—1995 年期间。我 1991 年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系留学,后转为读博士并于 1994 年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名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论文的基础上于 1995 年 1 月在英国将其出版为一本英文专著<sup>②</sup>。在这本书中,我就如何理解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一些马克思

---

<sup>①</sup> 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含义见本书第四编最后一篇论文《转向英美 超越哲学 关注“正统”》。

<sup>②</sup> Zhongqiao Duan, *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Avebury Ashgate, 1995.

## 2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主义学者,主要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的 G. A. 科亨教授进行了争论<sup>①</sup>。这一编中的六篇论文都出自这本书。这里需要指出,由于要在国内刊物发表的原因,它们中只有两篇,即《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过程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和《谈谈科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sup>②</sup>直接点明了争论的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另外四篇,即《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再考察》(《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3期)、《论经济基础的构成》(《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和《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则或者没有点明争论的对象是谁,或者把争论的对象换成了国内的学者<sup>③</sup>。由于我这四篇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方式及结构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的相关内容完全相同,因而它们基本上仍保留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争论的原貌。我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科学与社会》杂志(*Science and Society*)1997年秋季号(第429~432页)发表了加拿大布罗克大学社会学系默里·E. G. 史密斯教授为这本书写的一个书评<sup>④</sup>,书评对我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中与科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介。为了使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我与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争论的情况,我把这篇书评的译文<sup>⑤</sup>收录在这一编中,并把它作为第一篇。在

① 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肯特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称这本书是“一本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作出原创性解释并与科亨争论的著作”。(见他的《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54页。)

② 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但它与我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3期的“评科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一文基本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图示和几个引文,并在文字上作了少许修改,因此仍可视作那时候的成果。选取《哲学研究》这一篇的目的只在于使读者更容易把握科亨的思想。

③ 因为国内一些学者持有的观点与科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持有的观点大致相同或有类似之处。例如,科亨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概念不包括生产力,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的论据和论证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④ Murray E. G. Smith, *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by Zhongqiao Duan.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61, no. 3 (1997), p. 429 - 432.

⑤ 这篇书评的译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是我的学生郭志翻译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介绍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或流派上,而且还应进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从而最终达到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六篇论文收入本书的原因之一,希望它们能给读者一些启示。

第二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收录了六篇论文和三篇译文。由于在英国留学期间深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因而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出版之后,我开始进一步关注包括科亨在内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并着手准备把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余文烈请我给他出版的国内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写一篇书评,由于我那时已开始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篇书评就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评介》。我在书评中虽然高度评价了这本书,但在结尾的地方也点出了此书中一个值得商榷的提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的大问题,故此我与余文烈商定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于是就有了这一编中的两篇论文,即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的《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和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的《再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我在这两篇论文中提出并论证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不是特指20世纪以来流行的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而是泛指包括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内的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方法;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推崇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二是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整体主义。此后的四篇论文都是评介性的。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2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系统论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两个特征,并简要介绍了科亨的发展命题、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和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发表于《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

#### 4 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

的《科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论述了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的科亨为什么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这一转向对我们的启示;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的《罗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批判》,论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罗默从哲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三个批判;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的《约翰·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他如何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均衡模型构建这一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意义。这一编还收录了我的三篇译文,即科亨的《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以及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约翰·罗默访谈录》,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本主张、主要特征、各类成果及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生动具体的介绍<sup>①</sup>。

第三编“市场社会主义”收录了四篇论文和五篇译文。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关注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一年科亨来中国讲学,他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市场社会主义是当时在英美左翼学者中十分流行的一种思潮,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罗默等人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96年4月我到美国纽约参加“第14届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在会议上了解到不少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情况,并收集了一些最新的资料。1998年9月到1999年3月我被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聘为客座研究员,主要进行市场社会主义的

---

<sup>①</sup> 为了使国内学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了解,我还翻译了约翰·罗默的《在自由中丧失》(与我的学生刘磊合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伦敦大学乔纳森·沃尔夫的《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目前正在重译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

研究<sup>①</sup>。1999年,应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伯特尔·奥尔曼的要求,我把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译成中文出版<sup>②</sup>。这一编中的四篇论文都是在2000年后发表的。第一篇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的《市场为何能与社会主义“联姻”?——8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三个论证》,这篇文章分析了当代西方市场主义的三个理论前提,即“市场手段论”、“市场中性论”和“市场优越论”;第二篇是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论证》,这篇文章论述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两个新论证;第三篇是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的《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三种有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内容;第四篇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英美四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是否需要经历市场社会主义阶段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一编还收录了我的五篇译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是科亨1995年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的一篇讲稿,科亨在这篇讲稿中概括地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得以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基本理论,并说明了他为什么对市场社会主义持一种有保留的赞同态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戴维·麦克莱伦1996年来中国讲学的一篇讲稿,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

---

① 在此期间,我写了两篇与英美市场社会主义者争论的英文论文,一篇题为“Critique of Market-Superiority and Market-Neutrality”(《市场优越论与市场中性论批判》),发表于美国的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自然、社会与思想》), vol. 11, no. 2, 1998;另一篇题为“Market Socialists’ Three False Propositions”(《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三个理论误区》),发表于英国 *Critique: a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批判》杂志), issue 34, 2004。由于本书不收录外文,这两篇文章没有收入本书,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它们。

② 新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世界——伯特尔·奥尔曼教授访谈录》介绍了他为什么对市场社会主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的《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辩证的共产主义》和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阶段理论》是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詹姆斯·劳勒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的两篇讲稿，它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出发为市场社会主义作了辩护性的论证。

第四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英美马克思主义”收录了八篇论文，它们涉及当前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由于这三个问题都与徐崇温同志界定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直接有关，所以这八篇文章中有七篇是直接或间接与徐崇温同志争论的<sup>①</sup>。

第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同志自1978年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就始终坚持并极力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虽然很早就不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写文章与徐崇温同志进行直接的争论<sup>②</sup>。只是到了2000年，当我看到徐崇温同志批判青年学者王雨辰的文章《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sup>③</sup>时，才下决心写一篇公开与徐崇温同志争论的文章，因为我这时感到徐崇温同志的上述观点已严重阻碍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篇文章就是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与徐崇温同志商榷》。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区分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入手，论证了徐崇温同志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这篇文章被我放到了这一编的第一篇。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西方马克思

---

<sup>①</sup> 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徐崇温同志可以说是一位元老，一位对这一研究领域起过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的人物。我虽然一直很敬佩徐崇温同志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对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却不敢苟同。

<sup>②</sup> 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为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写的书评间接地表达了我的看法。

<sup>③</sup> 徐崇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主义概念”不是中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它是徐崇温同志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就有不少人对徐崇温同志界定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质疑<sup>①</sup>。我那时虽然隐约感到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不少问题,但却没作更多的思考。1991年留学英国期间,我曾问过戴维·麦克莱伦为什么他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混乱的概念<sup>②</sup>。在英国期间我还发现,西方学者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并不多,而且即使有人用这个概念,其用法也与徐崇温同志的用法大不相同。

我开始认真思考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在2003年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我在那次会议上发言的主旨是呼吁国内学者应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前些年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我已注意到,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地域已从西欧大陆转到英美,而且西方有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sup>③</sup>。但我感到与会者对我的呼吁作出积极回应的人并不多。这是为什么?我在会上与其他学者交换意见时发现,大多数人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特指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而是泛指由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肇始的、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包括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那强调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因为前者包含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为什么这样理解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发现是因为受到徐崇温同志的影响,是他首先这样界定和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sup>①</sup> 如杜章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一文中,就对徐崇温同志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

<sup>②</sup> 人们读一下他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就可以发现,他根本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sup>③</sup> 参见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使得很多人未加思考就接受了他的用法。这样说来,要促使国内学者把研究的重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含义入手,而这就免不了还要与徐崇温同志争论。所以,在这次会议以后,我接连写了四篇与徐崇温同志争论的论文,即发表于《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的《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的《对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说法的质疑》,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的《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和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这些论文从考察和分析西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入手,表明徐崇温同志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界定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会妨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当前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引起国内学者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在澄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长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对在当前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六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理论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此后我又写了一篇介绍当前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发展的论文——《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发表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它们构成了这一编中的第6篇和第7篇。

这一编的最后一篇论文《转向英美 超越哲学 关注“正统”——推进当前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是今年3月写成的。去年10月到今年1月,我又到英国